

# 杰夫·伯纳德与费鲁齐奥·罗西-兰迪

## ——一份基于研究视野相互欣赏的友谊

苏珊·佩特里利，奥古斯托·庞其奥著  
任伟译

1992年2月21日，罗马的匈牙利学术院举行了一场纪念意大利杰出符号学大师费鲁齐奥·罗西-兰迪（1921-1985）的国际会议。此次活动由雅诺什·凯莱门组织（Janos Keleman），吸引了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积极参与。杰夫·伯纳德出席了这次活动，他的身份是罗西-兰迪的朋友、罗西-兰迪及其工作的伟大崇拜者和促进者。

杰夫·伯纳德当时49岁，正是最富工作激情的年龄，他的热情常常感染到周围的人。无论在研究还是各种会议的组织方面，他都有很多思想。他既是社会学家、也是符号学家，同时还担任维也纳社会符号学研究所所长、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秘书长、《S-欧洲符号学研究》（*S-European Journal of Semiotic Studies*）主编、《符号学报告》（*Semiotische Berichte*）杂志联合主编。他策划的会议为大家提供了聚在一起分享研究心得的机会；他之所以如此投入，是因为他的理想，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种查尔斯·莫里斯所谓“开放社群”（open community）意义上的群体的群体意识。

1992年，他和雅诺什·凯莱门、格洛里亚·维塔尔姆一起，编辑了一期《S-欧洲符号学研究》特辑，题为《辩证法、符号学、唯物主义——纪念费鲁齐奥·罗西-兰迪》。

其实早在1985年，他就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Gloria Withalm）一起在《符号学报告》上发表过对罗西-兰迪所著《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的评论文章，1986年又发表了两篇关于罗西-兰迪的文章：

- 1)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辩证唯物主义符号学，分类—概览—图解”，见：《历史和符号学的历史描写——个案研究》，1985年10月2日至3日符号学明斯特分会第8次工作会议档案，克劳斯·D·达茨（Klaus D. Dutz）与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tter）编，明斯特：马科斯出版社，第329到366页。
- 2) “辩证法研究工作/社会历史调和：对罗西-兰迪社会进程符号学理论的意见”，见：《历史的符号——符号历史学论文集》，乔治·施密德（Georg Schmid）编，维也纳、科隆博拉出版社，第173-202页

1991年，伯纳德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发表了“一个关键的世界（思想、人物与事件），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刊登在《南欧符号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论文专辑上，1991年第三卷（1、2期合刊），第367-390页。

1992年罗马会议上，杰夫·伯纳德和马西莫·邦凡蒂尼（Maassimo A. Bonfantini）、雅诺什·凯莱门、奥古斯托·庞其奥一起，推进了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站的建立，并提议由研究罗西-兰迪的另一位重要学者、罗西-兰迪工作的另外一位推进者庞其奥担任该网站主席。

1994年到2004年，伯纳德担任了国际符号学协会秘书长（时任主席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en]，来自德国柏林；财务主任格洛莉娅·维塔尔姆，来自奥地利维也纳）。整整10年，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而这只是他所做贡献的冰山一角。无论是任职期间还是任职前后，伯纳德还在很多其他方面为推进符号学发展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然，毫无疑问，杰夫·伯纳德担任秘书长的这十年，对符号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来说是成就非凡的十年。杰夫·伯纳德担任秘书长的这十年，对符号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来说是成就非凡的十年。杰夫·伯纳德担任秘书长的这十年，对符号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来说是成就非凡的十年。

夫 伯纳德和格洛莉娅 维塔尔姆是非常出色的夫妇搭档，他们不遗余力地推进符号学在世界的传播，乐此不疲。

在维也纳，伯纳德和维塔尔姆组织了很多学术研讨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第十届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奥地利-匈牙利符号学哲学研讨会（奥地利维也纳，2000年12月8日9日，及11日），大会的论文集定名《神话、仪式、幻象与符号学观点》，收录于《应用符号学》（*Angerwandte Semiotik*）18/19,共两卷，2001年由奥地利符号学协会组织出版。担任这个两卷本的论文集编辑工作的，正是J.伯纳德和G. 维塔尔姆。奥古斯托 庞其奥在《符号》（*De Signis*）杂志由何塞·恩里克·菲诺尔（Jos e Enrique Finol）编辑、2006年9月出版的特辑《当代社会中的神话和仪式》（*Mitos y Ritos en la Sociedades Contemporánea*）中，专门针对该论文集发表了书评（见291到296页）。

符号学视角下的神话主题涉及文化、艺术、结构、意识形态、建模、叙述、想象等等，历史上不少优秀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些话题。其中包括维柯、卡希尔、朗格、巴尔特、列维-施特劳斯、以及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学者们。“神话”和“神话学”的主题也被应用到当代社会中，罗兰·巴尔特对新神话的分析就是一例。其中的“rite”一词不仅用到了其宗教意义，还用到了更普遍的文化意义。在标题措辞中 rite 比 ritual 更受青睐，因为 rite 似乎更具体地和礼拜相关。拟像（*simulacrum*）这个概念意思有些捉摸不定：既可以指表象、幻想、幻影、幻影般的，也可以指形象、再现、图像，在分析社会行为和文化的过程中，也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第二个意义使用该词的，我们找到的例子是让·鲍德里亚，他在对当代传播进行批判时，用到了“表象、幻想、幻影、幻影般的”这个意义。（参见“Introduction” by J. Bernard and G. Withalm, vol. I, pp. 13–22）

这两卷特别关注三个基本概念——“神话 myths”、“仪式 rites”、与“形象/幻象 simulacra”——，内容涵盖艺术与仪式、性别、政治符号、文体与文学、社会符号学、符号系统的多元性（Plurality）、文化与人类学、技术与新媒体。该论文集代表了在更新这些主题并对其详细分析方面的重要贡献，把这些主题中大多数时候沦为研究对象的“他者”，和我们的现在当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对接触到这部关于“神话 myths”，“仪式 rites”，与“形象/幻象 simulacra”的读者，我们可以说，这本书首先“讲述的是你的故事”。

《罗西-兰迪罗马会议论文集》于1994年出版，由杰夫·伯纳德亲自参与编辑，编委会还包括马西莫·A·邦凡蒂尼、雅诺什·凯莱门、奥古斯托·庞其奥，题为《阅读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符号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该书收入马西莫·A·邦凡蒂尼主编的“*Semiosis. Il senso e la fabbrica dei testi*”丛书中（Naples, ESI, 1994）。苏珊·佩特里利负责与文体有关的印刷排版事宜，并且和庞其奥一起编辑了罗西-兰迪的著作目录，将其更新至1993年。

伯纳德提交给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国际会议的论文，题为《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符号学》。单从题目已经可以看出，杰夫·伯纳德抓住罗西-兰迪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罗西-兰迪不只是一位符号学家。事实上罗西-兰迪视自己为哲学家，尤其是语言哲学家：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85年，题为《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Metodi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伯纳德的文章是1992年罗西-兰迪会议上宣读的第一篇论文，也是那次会议论文集的开篇论文：文中，杰夫保持了自己的一贯风格，分析准确详细。论文配有大量图表，先是呈现于黑板上（因为当时还没有 powerpoint），之后收录到论文集中。大量使用图表，也是他的典型风格。他喜欢将观念形象化，把他所谓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转化为图表加以呈现——其呈现相当精彩；这应该是因为他的艺术家天分吧。

和罗西-兰迪一样，伯纳德也是一个多面手：不仅是符号学家，还是建筑师、音乐家，当然，首先是个善于倾听的人。

伯纳德以图表的形式解释了作为虚假思想（false thinking）的意识形态，作为世界观的

意识形态，与作为社会规划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张图表中，他令人钦佩地将罗西-兰迪的“同型模式”（Homology Model）形象化；在另一图表中，将罗西-兰迪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加以呈现，这种模式在罗西-兰迪眼中揭示了一切事物的规律（the arche, the principium）。正如我们发表 Athanor 的罗西-兰迪特辑 *Lavoro immateriale* 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们和伯纳德一样，持这样一种观点：在罗西-兰迪看来，非意识形态的空间在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在一般行为领域内，还是在科学或者文学等领域中，看似“自然的”、“自发的”、“现实的”、“特定的”事物身上，都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结构存在。通过揭示这种存在，罗西-兰迪证明，行为与社会规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联系，因此在社会与意识形态规划之间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关联，不管问题涉及的是阶级社会（通常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相伴）的维护和再生产，或者是官方秩序的批判与颠覆。伯纳德的论证令人信服，他认为，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在罗西-兰迪的方法中，符号学才成了一种反异化的实践（disalienating praxis）（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2003-4: 208）。

对抽象方法，“抽象事物”和“总体性”，有一种误解误用，这种错误源于误认为某种抽象事物涵盖、穷尽了总体性的所有特征，以为不使用这种手段，这些特征就会被忽视或者遗忘。这就是约翰·迪利（John Deely）所讨论的“部分代替整体”（*pars pro toto*），这种提法出现在保罗·布伊萨克编的《符号学百科全书》中，具体见书中迪利编写的“托马斯·A·西比奥克”词条。西比奥克本人坚持自己提出的“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坚决反对这种谬误。罗西-兰迪在《符号学笔记》（“Note di semiotica”，该文最早于1967年发表于《新潮流》*Nuova Corrente* 杂志，后来又收录进1972年出版的著作《符号学与意识形态》（*Semiotica e ideologia*）中，也表达了与西比奥克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区分索绪尔式符号学（semiology）和皮尔斯式符号学（semiotics），这种错误在所难免。

之所以选择用皮尔斯式符号学（semiotics），而不是索绪尔式符号论（semiology）来指示研究符号的一般科学，不只是因为对某一术语的偏好，尽管这种偏好确实存在，这一点约翰·迪利（2004a）已经从词源学角度详细论证过。最重要的是，作为后语言与跨语言符号系统研究的符号论（semiology）不能与作为符号一般科学的符号学（semiotics）相混淆，因为后者研究的是所有类型的符号。

罗西-兰迪、西比奥克都避免将符号学 semiotics 与如是理解的符号论 semiology 混同。因此，二人的符号研究都摆脱了符号言语中心主义（semiological glottocentrism）的束缚。倒是语言学在认识到自身与研究符号的一般科学之间的外在联系之前，一直作为一种以言语为中心的学科单独存在。事实上，符号学有助于语言学更好地确定其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托多罗夫就很好地注意到这一点（Todorov 1977: 24[参见 Deely 2006]）。

按罗西-兰迪的方法，符号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理论平台，学科间的分裂主义有望在这里最终得以克服。西比奥克也在类似方向上努力，不过他批判了“桥梁”（bridge）这种比喻方式，并代之以“网络”（web）。

罗西-兰迪对人文学科之间的障碍壁垒问题进行了分析，用这种视角对语言的生产交换和物质的生产交换之间的相互关联做了理论梳理：“我的努力，旨在将两种总体性加以整合，把总体的语言生产和总体的物质生产整合进一个更大的总体性中，以期揭示这种更大的总体性中的某些结构”（Rossi-Landi 1972:288）。从1968年的《语言：作为工作和贸易》，到1975年的《语言学与经济学》，再到1985年的《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到他去世后于1992年出版的《符号与非符号之间》，这一方向始终贯穿在罗西-兰迪学术生涯中，成为其研究的显著特征。

因为与奥古斯托·庞其奥为系主任的巴里大学语言实践与文本分析系的合作，杰夫·伯纳德和格洛莉娅·维塔尔姆曾多次到巴里，再加上苏珊·佩特里利组织的各种会议出版的关系，他们就来得更频繁。1999年《S-欧洲符号学研究》出版了一期特辑，题为《符号学研究在

巴里》。因为杰夫·伯纳德的倡导，之前在1998年《符号学报告》，已经出过一期特辑《符号研究的符号》（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Signs of Research on Signs. Semiotische Berichte*, 22.3-4）。为了完成校对，让特辑早日出版，杰夫和苏珊·佩特里利有时到深夜都还在用电子邮件交流。杰夫慷慨的付出，无尽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让人印象深刻。

在我系的支持下，我们在巴里又组织了一次纪念罗西-兰迪的国际会议。大会的主题《罗西-兰迪的符号学在当下的相关性》，本身就是杰夫提议的。大会论文集定名《非物质劳动》*Lavoro immateriale*，由苏珊·佩特里利编辑，作为 Athanor《符号学、哲学、艺术、文学》丛书的一本特辑于2003年4月出版。（Athanor 始于1989年，创刊至今一直由奥古斯托·庞其奥担任主编）。

在各种大会会议上，我们荣幸多次与杰夫·伯纳德交流合作。1999年，国际符号学协会第7届世界符号学大会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杰夫邀请苏珊·佩特里利一同负责《符号过程，社群，社会性》（Semiosis, Community, Sociality）分组会的组织工作。杰夫60岁生日，我们也专程赴维也纳表示祝贺。格洛里亚·维塔尔姆为杰夫的生日特意组织了一次大会，并出版了由格洛里亚本人和约瑟夫·沃尔曼斯伯格合编的大会论文集《权力的符号，符号的权力》（*Macht der Zeichen. Zeichen der Macht/Signs of Power. Power of Signs*, 2004.）。苏珊·佩特里利专门撰稿《权力的责任与责任的权力：从“符号学动物”到“伦理符号学动物”》，（约翰·迪利写了《从符号学动物到伦理符号学动物再返回》予以回应，也收在同一论文集中），奥古斯托·庞其奥为论文集撰写的文章题为《权力、和平与战争的符号学：〈赫尔辛基最终法案〉<sup>1</sup>与美国防御策略》。

公平地说，我们与杰夫·伯纳德的友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感谢那条贯穿其间的特殊纽带：对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共同兴趣。当初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是因为罗西-兰迪。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杰夫，还是因为罗西-兰迪。那是在2005年12月13日到15日，当时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举行了罗西-兰迪国际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正是杰夫·伯纳德和凯莱门。参会的有布达佩斯的意大利文化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语言哲学研究集团、匈牙利科学院、维也纳社会符号学研究所、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伯纳德介绍的题目是《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及罗西-兰迪网简史》。这篇介绍文章收录在此次大会的论文集中，论文集由奥古斯托·庞其奥编辑，在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IFRN）发表，网址是 <http://www.ferrucciorossilandi.com>。

在《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社会哲学与社会符号学》（1994:69-94）一文中，伯纳德开门见山地指出：意大利哲学家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是我所谓现代符号学‘第四次思潮’或者叫做‘社会进化思潮’的杰出代表。”（第69页）他专门对罗西-兰迪关于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的“同源模式”（homology model）进行了探讨。他从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出发，从他的共同言语（common speech）中的建模概念开始（参见 Rossi-Landi, *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mune*, Padua, Marsalis, 1961），到《语言学与经济学》（Mouton, 1975），《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1985）中发展到极致。对罗西-兰迪而言，集体社会再生产中所包含的符号生产是“分布域”（distribution sphere）的一种核心方面。（Bernard 1994:69）：

确定符号在人类行为的总体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位置，首先让罗西-兰迪的系统能够在典型的社会符号学中立足，社会符号学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开掘。其次它成功绕过了“理想主义”符号学中的种种陷阱，不用担心会坠入漫无边际的泛符号主义泥潭。这种辩证的定位，同时排除了索绪尔主义/结构主义中的心灵主义倾向，皮尔斯符号学中时常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以及生物进化模式的弊端，直接指向推进三种

---

<sup>1</sup>1975年欧安会标志着欧洲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分水岭，其对于欧洲安全有着深远的影响。会议最终成果是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英文 *The Helsinki Final Act*。

模式的综合。

伯纳德用简单术语描绘当前符号学趋势，根据他的表述，当今符号学分为四支：皮尔斯式符号学 *semiotics*（思维逻辑）；索绪尔式符号学 *semiology*（语言逻辑）；符号的生物进化理论（从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 [Jakob von Uexküll] 到托马斯·西比奥克，生物逻辑）；最后是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符号社会进化理论（米哈伊尔·巴赫金，亚当·沙夫，格奥尔·克劳斯 [Georg Claus] 等人，社会逻辑）（Bernard 1994: 75）

罗西-兰迪对乔瓦尼·瓦伊拉蒂 (Giovanni Vailati)、马里奥·卡尔代罗尼 (Mario Calderoni) 等意大利实用主义学者加以重新诠释，对此，伯纳德赞赏有加。伯纳德发现罗西-兰迪论著中，意大利的民族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詹巴蒂斯塔·维柯，到 19 世纪的原型符号学家卡洛·卡塔尼奥 (Carlo Cattaneo)，再到贝奈戴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这些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黑格尔与罗西-兰迪之间的联系纽带，尽管中间不无矛盾之处”（Bernard 1994:75）。

葛兰西关于语言问题的话语 (*discourse on language*)，在这一点上无疑有其特殊地位，其价值仅次于巴赫金的贡献，而巴赫金则被视为马克思式的符号学（或者更准确的说，受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影响的符号学）的“奠基人”，马克思式的符号学已经成为社会符号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Bernard 1994:75）。

1999 年德累斯顿会议上，杰夫·伯纳德和苏珊·佩特里利共同组织了《符号过程，社群，社会性》分组会。在分组会介绍环节，杰夫指出，“社会符号学”并不局限于将符号学方法运用在社会问题分析中，它既关心表意过程，也关注交流过程，认为二者相互补充。“社会符号学”是现代符号学的主要潮流之一，具有很大潜力，有望在 21 世纪获得充分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杰夫又一次证明罗西-兰迪在这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他看来，罗西-兰迪提供了“社会符号学迄今所能获得的最完整最精密的方法”。他补充说道，罗西-兰迪的符号学建立在一种不可或缺的人类学原则上：将整个自然转化成文化，这种转变过程的基础是劳动，而劳动需要材料、工具、工人、操作、目的、以及产品。实际上，通过操作将材料制作为产品，这个转化过程在无尽的工作循环链中进行。而且，对罗西-兰迪提出的语言与工作之间的同源性、社会符号过程概念问题、符号（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与工作、社会、意识形态、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杰夫也做了详细论述。（Bernard and Petrilli 2003）：

符号可以通过物质 (*signans* 能指, *signatum* 所指) 概念加以描述，通过符号—劳动操作，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某种物质 (所指) 得以改变，借助与之相对的物质 (能指) 的中介作用，统一到一种产品 (*signum* 即符号) 中，由此生出一种社会产物，即符号本身。思维 (“意识形态”) 与交流只是符号—劳动这枚硬币的两面，虽然密切相关却又在现象学上表现截然不同。而社会依靠大量的人工制品，其中包括语言或非语言的符号，也涵盖物质产品，尽管有些可能微不足道。<sup>2</sup>

苏珊·佩特里利从杰夫·伯纳德的观点出发，继续推进这个理论。她自己的思考 (Petrilli 1998) 主要聚焦于符号过程和符号学的区别。她强调罗西-兰迪“共同符号过程” (*common semiosis*) 概念的重要性，进而引入了“符号学动物” (*semiotic animal*) 这一概念。其实这一表述罗西-兰迪本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在文章中使用过，而 20 世纪 90 年代迪利也在英语语境中使用过。在人类符号学的背景中看，“共同符号过程”要求将符号过程与符号学加以

---

<sup>2</sup> 见此前 Bernard 的 *Insideoutside, ideology, and culture* 一文。校对者在保证两段译文意思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保留两位译者各自的译文。——校对者注。

甄别。这里的“符号学”概念不仅指称有关符号的一般科学，而且也涵盖了人类的具体行为。不仅指人类使用符号的能力（符号过程 *semiosis*），而且还包括对符号进行反思的可能性（符号学作为元符号过程 *metasemiosis*）。依照这种观点，可以区分出人类生物符号学与人类社会符号学：前者将人类与动物等而视之，亦即人类不过是众多生物种类、符号动物中的一种；而后者则将人类作为一种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来加以研究（这种表达可能取代亚里斯多德的“社会生物”[*zoon politicon*]概念）。在生物维度与社会历史维度——亦即人类生物符号学与人类社会符号学之间，存在一个决定人类符号的特性的调节因素：这里，我们指的是语言，与言语不同的语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建模过程的语言。

同样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看到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的一大重要贡献。正如杰夫·伯纳德所强调的，罗西-兰迪将语言视为工作，从而从理论上建构了语言工作这个概念。通过这一概念的提出，罗西-兰迪为证明语言（随后又扩展到社会再生产中所包含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建设性、建模性、创造性特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罗西-兰迪认为，语言实际上既是一种工具，一种材料，也是一种建模装置（*modeling device*）。就语言是工作而言，语言与交流彼此并不等同。语言不能被简单化为交流，语言并未在交流中穷尽。究其实质而言，语言是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是交流成为可能的条件。相对于最终成为第二建模装置的言语来说，语言是第一建模过程。罗西-兰迪探讨包括了言语的可能性条件，（在早期的著述中就已经）提出了“共同言语”（*common speech*）这一重要概念（这一概念随后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发展成“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符号学无法避免在当下具有世界交流（*world communication*）和总体交流（*global communication*）双重特性的复杂的交流体系中展开分析。（参见 *Petrilli, 1998*）。按照这种研究方法，社会、社会性、社群等术语的区分变得很重要。比如说在社群问题上，就必须对“封闭社群”与“开放社群”加以区分，这一点在查尔斯·莫里斯（莫里斯是罗西-兰迪研究得最多的学者之一）的 1948 年的名著《开放的自我》中已经有过清晰的表述。

在论文《罗西-兰迪理论视野下的“交流—生产”》（参见 *Lavoro immateriale. Athanor, 2003-4, pp.25-43*），伯纳德对当下符号学的思潮做了全面呈现。该文继续对罗西-兰迪的研究进行详细阐述，梳理出了从“共同言语”，到用“符号工作”（“同源模式”）来描述符号生产，直至“共同符号过程”（*common semiosis*）的发展路线。

伯纳德发挥其一贯出色的综合能力，他写道（同上：25-26）：

现代符号学群落，亦即构成现代符号学的主要观点（模式，思潮），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回顾，诸多大小思潮其实可以概括为四类。分类中的特性描述难免稍显粗略，却不无用处。具体而言，这四类包括我们所谓的“语言逻辑”（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模式，或称“结构主义”）；“思维逻辑”（洛克—皮尔斯—莫里斯—本泽模式，包括相近领域）；“生物逻辑”（或称“生命逻辑”；冯·尤克斯库尔—西比奥克模式，或称生物进化论，或生物遗传符号学）；以及“社会遗传符号学”。米哈伊尔 M. 巴赫金（特请参见 *Voloshinov 1929*）和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后者更甚）都强调符号过程、符号、符号使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之前的路德维希·诺瓦雷（1877）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潮的先驱，他将“共同活动”（*common activity, "sympraxis"*）视为语言和意义的基础，后来的列夫 S. 维果茨基（1962, 1978）在其心理社会符号学理论中也持相同观点。但是，这“第四种思潮”（我个人的术语）的真正奠基人毫无疑问是巴赫金，巴赫金以“对话性”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强势的反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格奥尔·卢卡奇（例如，1963 年《审美特征》）在其著述的符号理论部分将工作和语言相关联，就已经注意到了罗西-兰迪的研究，肯定了其真知灼见。当然，也出现了其他社会经济学理论：比如阿尔弗雷德·舒茨（提出阐释社会学；参见 1974）；紧跟乔治 H. 米德脚步的“符号互动论者”；离现在更

近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看，韩礼德 (M. A. K. Halliday, 1978)，阿尔吉尔达斯 J. 格雷马斯 (1976)；而格奥尔·克劳斯 (1973) 为世人熟悉的观点是：强调人作为符号创造者和符号使用者的作用 (当然，运用相关方法的学者还有很多，比如说亚当·沙夫和拉萨尔 O. 列兹尼科夫 (Lazar O. Reznikov)；限于篇幅，笔者仅举以上学者为例)。

文中将巴赫金 (沃洛希诺夫) 和罗西-兰迪联系起来，同时还提及格奥尔·克劳斯和亚当·沙夫，对此，我们非常赞赏。关于罗西-兰迪、克劳斯和沙夫之间的异同，我们已经在多种论著中有过讨论。(参见 Ponzio, “Semiotics and Marxism”, in Thomas A Sebeok, Jean Umiker-Sebeok 1989:387-414)。我们把罗西-兰迪的“社会再生产”“共同符号过程”概念与西比奥克的“生物圈”“总体符号过程”(global semiosis) 概念结合起来使用，来对当下的“全球交流 (global communication)”中的符号学秘密进行批判分析，或者，用我们更喜欢的术语，叫做“交流—生产”(以示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交流本身也成了一种生产力)(可参见 “Being communication. For a Critique of ontology”, by A. Ponzio, in *Semiotic Studies in Bari*, a special issue of *S / 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edited by S. Petrilli, 1999, pp. 515-528; A. 庞其奥, S. 佩特里利合作的意大利语专著 *Il sentire dellacomunicazione globale* 和 *Semioetica*, Rome, Meltemi, 2000 e 2003; 以及二人合作的英文专著《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ative Routes in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一方是西比奥克的“生物逻辑”或称“生命逻辑”，亦即从尤克斯库尔—西比奥克模式发展而来的生物进化理论或者生物遗传符号学，另一方是罗西-兰迪的“社会学逻辑”或“社会的逻辑”(这种研究同时具有对话性、社会进化论、社会遗传符号学性质，由巴赫金—罗西-兰迪模式发展而来)，伯纳德在“生物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找到一种联系。对伯纳德的这种思考，我们深表赞同，并且沿着相同的路向予以发展。正如我们在合写的《语言的概念》一文(载 *Lavoro immateriale*) 中指出的，罗西-兰迪关于“语言作为工作”提法和西比奥克“语言作为主要建模机制”，二者之间存在联系。

恰如我们所料，商品化的、异化的工作已经成为今日社会制度的显著特征。“语言工作”这种表述让人想起还有一种可以与之并置的可以游戏的东西，因而让人认为，正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所描述的那样，语言工作是作为默思游戏 (play of musement) 的对立面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西比奥克借默思游戏来标明人类是符号学动物，以此来证明人类主要的建模机制或者他所谓“根本意义上的语言”。

事实上，“语言工作”和“默思游戏”概念彼此并不矛盾。罗西-兰迪曾经这样解释，工作和游戏并非并置；实际上，游戏除了要有表演工作，还需要有预先准备工作，这类工作无疑非常愉悦、特别快活。

在另外一点上，罗西-兰迪与西比奥克不谋而合：一些学者试图从交流的需要出发，来解释语言起源。对此，两人均表示反对。在罗西-兰迪和西比奥克看来，人类工作的构成、组织、分工合作之所以可能，正是借助了语言。言语和历史自然语言都有一个前提，即：存在适合人类建模、具有句法建构和解构能力的语言，因为句法的关系，这种语言有能力创造无限的可能世界。(参见 Ponzio and Petrilli 2003-4: 218; Deely 2007)。

上文中提到，杰夫·伯纳德很欢迎一些文章在他主编的《南欧符号学研究学刊》上发表。下面，我们就摘取这些文章中的一些段落以飨读者。

如罗西-兰迪所言，人类社会通过一般社会再生产来实现自身的承续，“再生产”概念本身就说明这一过程肯定涉及再生、维护、和保持。但是，恰恰因为对人类社群“存在”(being) 的坚持，社会再生产已经有了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形成的)。其中有碍社会再生产的，遭到排斥抛弃——因为社会关系体系不同，以及人类智力、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



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更合适更有利的方式占据了主导。

社会再生产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存在摆脱特定社会制度中已有的“存在—交流”（being-communication）的可能性。通过对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重新组织，这种摆脱可能实现，而重释和重组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人类有阐释能力，有能力对“存在—交流”做出其他反应，有能力和与之相应的世界观保持距离，从而规避造成“存在—交流”现状的这个世界的种种局限并实现对其超越。交流与存在是生命的典型特征，在人类社会再生产中，可以克服将“交流”与“存在”等同，因为行为主体是“符号学动物”（*semiotic animal*），这种动物不仅具备建立交往关系的能力（而其他动物，如马克思所言，**没能适当地建立关系**），而且还具备批判评价能力、有意识、有责任感、有谋划能力，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主体可以对交往关系进行规划。因此，这种符号学动物最终有能力回避存在—交流。

另一方面，交流—生产中的持续是**同一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出于求生本能，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调整变化，本身尚未终结，尽管它出现在薄暮时分（黑格尔“智慧的猫头鹰”<sup>3</sup>），已经显现出进入尾声的迹象。只有对维护资本主义有用的意识形态才会将存在（在这里即交流—生产存在）与一般社会再生产中的存在—交流等同。这种等同是如此的贴切，以至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人类看来非常自然，仿佛是唯一的选择，似乎成了人性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一旦经济发展、文化成就、科技进步按照线性发展过程达到高水平，存在—交流就被视为人类生存中必要的恒常模式。

维持交流—生产的存在是毁灭性的。同一生产周期的再生产也是毁灭性的。它毁掉了：

- 机器，旧机器被新机器替代，不是因为磨损，而是源于竞争；
- 就业机会，自动化导致失业增加；
- 市场上的产品，刺激各种消费主义，为生产周期的再生产服务；
- 可以穷尽需求的产品，通过生产新的类似的产品，让原有的产品过时；
- 不能在全球交流—生产的竞争中存活的商品和市场。

交流—生产的自我持存（*conatus essendi*）破坏自然环境和生物形态。它破坏经济文化体系的多样性。自我持存逻辑一味地强调发展、生产效率、竞争力，但凡与之有些矛盾或者对其无用的传统和文化遗产，都会遭到毁坏。市场逻辑作用下的同素化（homologation）过程消灭差异性，不仅让行为、需求趋同（尽管满足需求的可能性永远不会相同），而且让欲望和想象物也失去差别。

交流—生产的自我持存破坏可能规避现阶段生产体系局限的生产力。结果，受市场逻辑影响，为追逐市场潮流，智力、发明才能、创造能力均遭羞辱排斥。

今日生产制度中的破坏性品质在以下事实中也得到证实：作为发达的条件，它导致了欠发达区域面积更大，引起范围更广的剥削和不幸，致使一些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由于客观存在的国内空间限制，所谓的“发达”国家需要对愈演愈烈的移民潮加以控制，但这种控制常常困难重重——其难度无疑超过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其他阶段——究其根源，正是上述机制在起作用。

全球交流—生产也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是战争的交流—生产。继续战争就意味着为正在生产的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赢得市场。战争需要得到批准，获得认可，需要师出有名，需要被视作抵御险恶“他者”所代表的与日俱增的危险的必要手段，被当作一种为自身的“认同”（identity）和“差异”权益（difference）赢得尊重的方式。但实际情况是，认同和差异并未受到“他者”的威胁或破坏。悖谬的是，这种社会制度本身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一方面鼓励、推

---

<sup>3</sup>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里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的时候才悄然起飞。这里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



进认同与差异，另一发明又让认同与差异变得虚幻。认同受到威胁也可以导致认同偏执，而这正是战争的交流—生产所期望的。

将市场普遍化是破坏性的。这意味着将商品的性质延伸到所有事物，延伸到各种关系。商品越是非法，越是昂贵：毒品、人体器官、儿童、子宫等等，不一而足。剥削他人劳动的原则本身就已经具有破坏性。单位小时的劳动酬劳越低，劳动创造的利润就越高；今天，得益于全球交流，发达国家不断追逐不发达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待在原地别动，我们过来找你”）。剥削童工让今天的传播-生产世界蒙羞（今天，很多孩子饱受贫穷、不幸、战争之苦。他们或流落街头，或在市场上充当童工，遭遇各种虐待，遭受压榨剥削。关于这些儿童，有太多需要说，需要做的。）

如果认为交流—生产这种存在方式应该继续下去，那势必会危及社会再生产，因为它妨碍人类的历史社会存在，让其无法以新的社会形式重组自身，因此

——交流—生产不利于社会再生产。

人类具有发明、创造、重新规划和重新建设的能力，这些能力成了人类的特征，而交流—生产渲染交流，对这些能力不利，而人类之所以具备这些能力，是由于我们的主要建模装置语言，因此

——交流—生产不利于语言（不利于符号学）。

再者，交流—生产的再生产危及人类生存本身，也就是说，不但是作为智能存在、符号学动物、智性动物的人的存在受到威胁，即使仅仅作为有活力、能生存、能完成必要的符号过程的活物的人，其存在也失去了保障，因此

——交流—生产不利于人类生命（符号过程）。

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强化、扩展现有社会制度，亦即交流—生产模式，是对全球生物的致命威胁：臭氧层空洞，再生产周期引发的种种灾难，与战争的交流—生产相关的各种不幸，正常繁殖机制功能失调造成的一幕幕生态悲剧；核武器的恐怖摧毁力及相关实验等等，因此

——交流—生产不利于整个星球的生命的存在—交流（符号过程）。

在 *Athanos* 的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特辑 *Lavoro immateriale* 上，杰夫·伯纳德专门著文，就“交流—生产”概念展开讨论，这一点从其文章标题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中特别提到佩特里利和庞其奥合著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打开边界的符号学》对之前提及的学者进行了批判分析，其中对皮尔斯、巴赫金、莫里斯、西比奥克、罗西-兰迪、沙夫和维多利亚·维尔比尤其关注。

伯纳德说（同上：35—36）：

该书有七章专门介绍现代符号学中影响深远的学者，其中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所占篇幅最大，这绝非巧合。按照我的理解，两位作者意图标明：现代符号学中罗西-兰迪的概念对理解当代社会的运作和结构相当重要；想要展示罗西-兰迪理论，通过“共同符号过程”，以及一般人类符号学，对（具体到物种的）人类符号生产和符号使用事宜进行了非常全面系统的阐释。与此同时，两位学者也并不否认罗西-兰迪的研究成果可以置于甚至范围更广的“总体符号学”（西比奥克术语；参见 2001）中。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同意他们的这种看法，因为从更开阔的视角来看符号过程，冯·尤克斯库尔的生物符号学（实际上构成了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的基础）可以和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做系统的“调和”。（比如可以参见 Bernard 1995）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的作者们新创了“交流—生产”一词，这无疑和他们的罗西-兰迪研究背景有关，他们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事务纳入一个颇有启发的精确公式之中。

无论是罗西-兰迪，还是佩特里利和庞其奥，都对相关主流科学中“communication”的狭义理解（不幸的是符号学文献中也有部分属于此类）进行批判，前者批判是因为系统的缘故，而后者是出于本体论的考虑。

这篇文章最后一段的标题为《图表化的“交流—生产”》（第38页）。这一部分，伯纳德用一系列图表对“交流—生产”做了呈现，简明扼要地展示了作为罗西-兰迪社会观、社会再生产观念结果的“交流—生产”概念背后的总体趋势，重点聚焦符号、共同符号过程的中心地位和整合作用（同上：40-41）：

这一点从无足轻重的物质生产等事物的外部三角关系的加速消解上就可以看到。物质生产面对日益频繁的危机，甚至在部分领域中面临崩溃。物质性日常基础设施的再生产越来越无利可图，所有可观的利润都留给了远程信息处理技术、信息科学、仿生学，以及在它们之后可能会涌现出来的新领域。

终于，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这个社会看来完全是由“非物质化”的“交流—生产”及其衍生物与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些不尽人意的物质）构成（参见图4c，就不解自明了）。“交流—生产”取代了这样的生产：这种推测历史的视野迄今主要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加以批判讨论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可以一直存在，不断产出更多，最终只是产生了“上层建筑”，如果[.....]，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我已经将问题从罗西-兰迪式的，也就是说，像他自己曾经强调过的，马克思式的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加以呈现，这种视角方便更好地进行区别分析，考虑到了更全面的观点。简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认为有这种社会有存在的可能性：一个社会可以简单成“交流—生产”，以“交流—生产”为基础，把“交流—生产”作为表现形式，并在其中终结。首先，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总是一个矛盾整体，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变。整体中不可避免会有社会自身变化的原因和载体。其次，从经验主义角度说，同时也是第一点的鲜明例证，既然“交流—生产”只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既有建立在这种机制上的（只是相对）的第一世界，也存在物质生活贫乏的第三世界，而同时第三世界正在越来越多地靠拢第一世界——这不仅仅是个地理问题.....所以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结论中，伯纳德提到了我们的“伦理符号学”，认为这可能是罗西-兰迪工作的继续。（但是我们也可以加上皮尔斯、维尔比、巴赫金、莫里斯、沙夫、西比奥克，“伦理符号学”也是对这些学者所从事的研究的继续）。（同上：40—41）

谈到对事态及其后果的理论思考：如果社会符号学被视为一种基于生态学归纳出来的总体符号学的具体的、用以满足特定物种的应用，这种观点下，甚至佩特里利和庞其奥提出的伦理符号学也可能得到全面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有一种更合宜的智力工具来应对那种单向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杰夫·伯纳德指明了庞其奥、佩特里利的“伦理符号学”和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的关系，而实际上早在德累斯顿会议期间，在和伯纳德一起组织的分组会发言中，佩特里利就已经对这种关系提前做过说明。当时她在发言中说，伦理符号学的批判工作揭示了在全球化世界的当代社会中，已经不可能有彼此不相关的种种差异的存在，这种存在只能是一种幻觉。另一方面，整个星球的命运其实都包含在我们的所有选择中（也请参见Ponzio and Petrilli2003）。伦理符号学必须对最初产生和倡导伦理符号学的社会制度本身进行公正的分析和讯问，不带任何偏见。伦理符号学必须从我们今天所在的历史社会位置出发，换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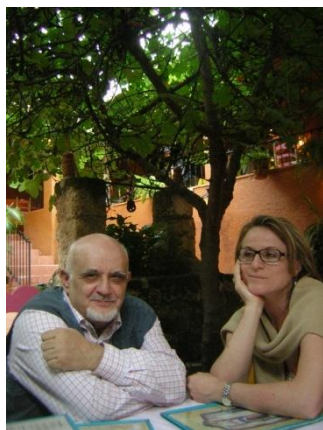
必须从当代性出发。这种方法要求对当前全球交流—生产关系体系进行严格准确的分析（参见Bernard and Petrilli, 2003）。罗西-兰迪对异化社会的批判，预先设定人有能力构想出不同世界、有能力对这些世界的建设进行或者乌托邦式的或者科学的沉思冥想。既然具有语言工作能力，有能力发挥沉思冥想的作用，人类就有资格质疑现状，有义务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相对于被异化的现实，罗西-兰迪为之奋斗的是一种作为“他者”的现实，他并不把自己的方法限制在对现实的阐释上，尽管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甚至也是在阐释现实。相反，在人类符号过程的背景下，罗西-兰迪重视社会规划、意识形态批判，也因此将关注重点放在人类建构、解构、重构新的更好的世界的的能力之上。从这种观点看，罗西-兰迪的工作可以和笔者所谓“伦理符号学”联系起来。从理想的发展路线看，这种“伦理符号学”也涉及我们之前提到的学者，诸如米哈伊尔·巴赫金、维多利亚·维尔比、查尔斯·莫里斯、亚当·沙夫、以及查尔斯S. 皮尔斯，尽管皮尔斯著作的阐释中存在某种认知歧视。

在《费鲁齐奥·罗西-兰迪及罗西-兰迪网站简史》(2007)中，杰夫·伯纳德首先回顾了1992年以来为纪念罗西-兰迪召开的历次会议。他将自己的陈述分为两部分：1) 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生平及其已列入二十世纪下半叶符号学“经典”的著作的简要回顾和评价。2) 国际费鲁齐奥·罗西-兰迪网(IFRN)。除开之前已经提到的会议，历次会议单上我们还要加上1995年，为纪念罗西-兰迪逝世十周年而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召开的大会。“两天的研究与缅怀——纪念费鲁齐奥·罗西-兰迪逝世十周年”，1995年11月24日在博洛尼亚召开，由圣图奇(Santucci)组织召集；同年12月6日在帕多瓦举行，由伯蒂主持，罗西-兰迪的前妻，著名学者吉纳维芙·沃罕(Genevieve Vaughan)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的联合组织方是国际空间与时间历史中心(Centr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dello Spazio e del Tempo)(CISST)，该中心位于帕多瓦附近的布鲁吉内(Brugine)，专门建设有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档案。

与杰夫和格洛莉娅一起度过的日子始终萦绕于脑际，回忆中总是充满欢乐。那是巴里的一个冬日，虽然有些许阳光，但还是有些寒冷，杰夫坐在外语系前面的花园里，旁边是格洛莉娅，他们应邀专门过来参加一系列社会符号学会议。我们在一起高谈阔论，当聊到那些计划共同推进的研究时，我们热血沸腾，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期望。杰夫——我们会继续下去，不用怀疑。你留给我们的见解建议，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真知灼见必将陪伴我们继续向前，仿佛你从不曾离去。

本文原题为“*Jeff Bernard and Ferruccio Ross-Landi A Friendship Founded on Mutual Appreciation of Respec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s*”，原刊载于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6.1-4 (2010), 67-92



(庞齐奥与佩特丽莉)